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游
歷
日
本
圖
經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清東遊日記彙編

王寶平 主編

游歷日萃圖經

清·傅雲龍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游歷日本圖經 / 王寶平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3
(晚清東游日記彙編)
ISBN 7—5325—3387—5

I. 游... II. 王... III. 日本—歷史 IV. K313.0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08279 號

晚清東游日記彙編
游歷日本圖經

(清)傅雲龍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41 插頁 9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387—5

K·465 定價: 120.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 64063949



傅雲龍像（攝于光緒十四年游歷美國期間,載《養喜廬文二集》卷首）

大清特派游歷
日本美利加秘魯
巴西古巴英屬地
知府用加三品銜
兵部郎中傅雲龍拜

傅雲龍游歷各國期間所用名帖（浙江圖書館藏）

二十五年十月廿八日

外務省

第三三三二號

啟者茲有敬國

欽派遊歷官兵部員外郎傅雲龍刑部主事顧厚

焜二員前來貴國欲往內地各處遊歷隨帶

翻譯官澤村繁太郎傅范冕及僕人趙順

熊增共四人可否即請

貴大臣各給遊歷全國特別免狀一紙計以

一年為期以便該遊歷官等隨意得以遊

覽實深欣感并祈

轉飭各地方官照料保護於一切可以遊視

之處代為引導尤所感禱此懇即頌

日社

光緒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欽差大臣徐承祖

外務大臣伊藤博文閣下

外務省

駐日公使徐承祖致日本外務大臣伊藤博文函（參見前言第二十二頁）

用紙

上差

機密身廿二日
 北京政府於言官奏上ヨリ海外各國
 官吏ノ派遣ニ事情視察セシメテ得テ議相
 成後股右ノ官吏ニ試験ノ上後去ルヲ擇抜
 元等ニ會報澤村繁太郎此等ノ機密ニ試
 驗ノ者有然レ北京政府ノ派石華毅ノ下
 此等ノ機密ニ淋淋數ノ有之ヲ我ニ此度ニ試
 驗ノ者一位ノ合ニ手ニ唯テ成スハノト請相
 心者官吏中ニ此等ノ有股試驗ノ同動ニ德外
 欽差論海軍論等ノ十折六事ニシテ必ズ之
 數ノ大議論ヲ早ニシテ此輩ニシテ流外
 シテ他國化ガ流一一位ノ有ニ至有難有之

右試驗ノ結果ヨリテ本邦及米國ノ派遣
 者二名即兵部郎中傅雲龍刑部主事顧厚
 焜ニ是レ北京ノ出發ニ當テ下リ李鴻章面
 會シテ先十九日上海ニ向テ出發致復右二名北京
 吏中ノ後派者三可有之且ニ其守ニ開代者派
 可有之者清共凡ク外國ニ至ルハ勿論外人ノ持
 ト今回ラシテ始メテ程ノ人ノ有之年齡大抵五
 十前後ノ有之支那派ノ文筆ヲ以テ固結致友
 可有之者其本邦ニ至ルハ日本物ヲ觀察
 シテ如何ノ見解ヲナスニヤ然レテ豫想スル
 後右二名派達半當歸テ訪問シ在長崎ノ朋友
 紹介セシニテ請承致復角日下縣知事ノ死ヲ紹介
 狀相誌ニ差出有他ノ紹介セシニテ希望致居

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領事波多野承五郎致外務大臣伊藤博文的機密信（共五紙，參見前言第三頁）

後様子ニヨリテ視察スルニ本邦ニ至ルノ日交支リ求ムルノ
 必要アルニ其今日之感スル所ニカカレテ所ノ所ニヨリ
 右二名ノ行季中許多ノ古書ヲ讀ムル由リ有之候ニ此
 等書者本邦ノ儒派ニ示シテ利益スルハアラント思考
 スモト被存候右通リテ政体去別及風俗改良
 等事ニヨリテ實ニ深キトシテ思想スル能ハルモト存
 存右二名ノ旅費ノ外毎月三百兩ノ支給スルモ
 之ヲテ滞在費ニ充テラナリトシ有之友派遣ノ
 期限ニ二年ニシテ本邦滞在ノ半年ヲ見込有
 之其内琉球ト北海道ノ巡歴致候積リト申括
 後此間ニ長崎早瀬船ニテ直ニ東京ニ至リ同地ニ於
 テ内地旅行免状ノ得ラ各地方ニ到ルベシトノ有之候
 此回ノ巡歴ニ無論秘密ニ與之存清共旅費其他ノ
 費用制限アル為ナルカ杜官ヲ訪問セルモ頗ル簡
 略ヲ主トシ平服ニテ從者ヲモ召連レズト來館致
 候

右二名ノ通稱人トシテ北京留學生澤村敏太郎ナル
 者那相備復同人ノ耶蘇教會員ニシテ留學上海ノ
 耶蘇學校ニテ後々轉シテ北京ノ耶蘇病院ニ至リ
 醫學修業ニ傍ラ支那語學ヲ研究致候候處
 同文館教頭トシテ又同ノ日英清三國ノ語
 通シ見テ右視察者ニ紹介シ隨行致候事ト致
 後同人等今日本邦ニ歸國スル由リ北京ニ歸リテ
 周遊所見報告書編纂ヲ助成ル目的ト有之目ツ
 日清兩國ノ關係ニ付右二名ノ視察者ニ認解ヲ起
 カシテ我兵制ニ事出辰商奇ノ感言ナルヲ示シ候

駐天津日本領事館

清國對テ政略願 平穩ト主ト他意ナク知ラシ
 ノ為様尺力可致謝申會置後
 左行上海出發ノ多分本月廿日頃 伊能元(ト)右津
 右直申ニ及後也
 明治三十四年十月廿日 天津
 領事 波多野 津五郎
 外務大臣 伯伊藤博文 殿

駐天津日本領事館

總序

王寶平

據考古發現，日本列島長期與大陸緊密相連，大約在一萬年以前才逐漸形成目前這種一水相隔的狀態。地緣的相近，決定了中日兩國必相往來，而文字的相親，極大地增加了交往的密度。自古以來，中國的載籍對日本以及中日間的交往可謂史不絕書，它們為我們研究古代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中日關係史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豐富史料。但是客觀地說，這些史料往往帶有中華文化中心的思想，含有不少獵奇、非科學的成份。這可謂中國之日本研究的第一階段。

有明一代，倭寇撓邊，警報不絕，人民的生命財產慘遭塗炭，朝廷統治受到威脅。抗倭鬥爭的需要促使一大批將領幕僚研究日本，從而產生了《日本考略》、《日本一鑒》、《日本考》等一系列研究日本的專著，形成了第一次日本研究高潮。這是日本研究的第二階段。

明亡清興，邊患消除，天下太平，於是日本研究復趨平靜。這時期，通過長崎一隅，中日貿易頻繁，由此誕生了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東洋記》（一七三〇年）、童華的《長崎紀聞》（一七三五年）、汪鵬的《袖海篇》（一七六四年）等一批以日本長崎為背景的作品，以反映中日貿易為中心是第三階段日本研究的特色。

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開始走脫亞入歐之路。日本的變化引起了近鄰中國的關注，有關日本動靜的報導經常出現在報端。(一)初時，清廷對這「蕞爾小國」心存幻想，欲籠絡之為我所用。臺灣一役，日本一開始就訴諸武力，顯示出後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急迫和露骨，朝野為之震驚。緊接着，炮擊江華島、吞併琉球等事件接踵發生，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昭然若揭，迫使中國對之高度警惕。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日本研究漸次進入以防範為主要目的的第四階段。

這階段的前期，即光緒前十年誕生的著作以日本遊記爲主，從李圭的《環遊地球新錄·東行日記》（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起，中經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的赴任日記《使東述略》（附《使東雜詠》，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副使張斯桂的《使東詩錄》（同上）、王韜的《扶桑遊記》（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王之春的《談瀛錄》（同上）、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同上），一直到李筱圃的《日本紀遊》（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大多以日記和詩的形式記錄訪日觀感。這些遊記的作者，有的如王韜、李筱圃純粹爲了遊歷，但有的如王之春本身就是借觀光之名，行偵察之實。^{〔四〕}至於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等外交官，他們雖沒有王之春那樣的直接使命，但中國一八七七年起對日遣使，除管束當地中國商民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藉探彼族動靜，冀可聯絡牽制，消弭後患」。^{〔五〕}因此，可以認爲他們寫的報告^{〔六〕}對朝野認識日本，進而作好防範準備，間接地起到了作用。這些遊記克服了傳統的日本研究者往往沒有親歷過日本的先天不足，是明治維新後中國人從日本傳回的第一批報導，標誌着摭拾傳說的歷史終結，一個面貌一新的研究日本的時代開始了。

光緒十年起，國人的日本研究又有了深化和發展。與浮光掠影的遊記相比，著作中多分設天文、地理、河渠、國紀、風俗、食貨、考工、兵制、職官、外交、政事、文學、藝文等類，對日本進行百科全書式的綜合考察。如姚文棟的《日本地理兵要》（十卷，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和《日本國志》（十卷，同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四十卷，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葉慶頤的《策鰲雜摭》（八卷，同上）、陳家麟的《東槎聞見錄》（四卷，同上）、顧厚焜的《日本新政考》（二卷，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以及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三十卷，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等。這類百科全書式的研究，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大量採擷日本的有關圖籍、統計報表。在今人看來，與其說它們是研究著作，不如說是資料集更爲貼切。時至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手捧這些著作，還不時爲其資料之翔實而心折，爲作者嘔心瀝血的搜尋精神而心動。正因如此，這時的著作往往卷帙不小，傅雲龍和黃遵憲的上述二書分別達三、四十卷之多即爲顯例。以光緒十年爲界，如果說此前的研究以遊歷（感受）爲主的話，那麼此後則長於記載（資料）。這種變化完全符合人們認識事物由表及裏，由淺入深，由單一到綜合的一般規律，清楚地表明中國知識分子決心沉下心來全面、冷靜地認識日本，認真應付來自昔日朝貢之國發出的咄咄逼人的挑戰。

在上述第四階段的日本研究中，還誕生了一批較為特殊的著作——中日詩文唱酬集。與吳汝綸、薛福成、張裕釗並稱「曾門四子」的黎庶昌先後二度出任駐日公使，他在日六年間，主持或參加的中日文人唱酬盛會不可勝數，其中結集出版的就有《癸未重九讌集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戊子重九讌集編》（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己丑讌集續編》（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櫻雲臺讌集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庚寅讌集三編》（同上）等等。

在黎的身體力行下，使館其他隨員亦紛紛響應，大顯身手。其中，孫點為個中翹楚，他個人的唱酬集就有《嚶鳴館春風疊唱集》（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嚶鳴館疊唱餘聲集》（同上）、《嚶鳴館百疊集》（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等數種。

黎庶昌等人熱衷於詩文活動，除了有文人雅興的一面外，作為外交官，自有其良苦用心。在強鄰環伺，國力不濟之時，他欲以詩文廣交朋友，以人格魅力感染別人，從而團結、聯絡更多的日本友人，實現中日聯手抵禦西方列強東侵的外交目標。「大局自關吾輩事，好懷須向素心開」、「求友嚶鳴爭出谷，等閒鷗鷺（歐洲與俄羅斯——引者）漫驚猜」、「關心最是中東局」^{〔七〕}等詩句即為黎氏這種心跡的自然流露吧。

除了外交官外，這時期不少寓日文人也積極投入唱酬活動，《蓮塘唱和集續編》（小野湖山，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愛敬餘唱》（大槻磐溪編，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日本同人詩選》（陳鴻誥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扶桑驪唱集》（葉焯編，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等詩集中即留下他們的痕跡。他們與駐日使團一起，一官一民，互為補充，為增加中日間的互相信任、促進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學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八〕}

正當文人沉浸在詩文唱酬、觥籌交錯之中時，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戰爭不但摧毀了洋務派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也打破了黎庶昌等人孜孜以求的中日兩國唇齒相依、共禦西方列強的美好願望。從此，維繫了千餘年的中日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沉睡的雄獅開始具有了群體意義上的覺醒，一個以強敵為榜樣、尋求民族自強的時代到來了。我們姑且將這一時期的日本研究稱作第五階段。

這時的日本研究以考察記為主，如教育考察記有姚錫光的《東瀛學校舉概》（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朱綬的《東遊紀程》（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等，軍事考察記有張大鏞的《日本武學兵隊紀略》（同上）、丁鴻臣的《四川派赴東瀛

遊歷閱操日記》（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等，農工商考察記有潘學祖的《考察東瀛農工記》（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許炳榛的《乙巳考察日本礦務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劉學詢的《遊歷日本考察商務日記》（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等，政法考察記有劉庭春的《日本各政治機關參觀詳記》（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王儀通的《調查日本裁判監獄報告書》（同上）等。此外，綜合性考察記有謝紹佐的《東遊分類志要》（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楊道霖的《日本統計類表要論》（同上）等等。

與以前任何一個階段相比，第五階段的日本研究性質迥然不同，全面學習日本成了主旋律。在維新派眼中，這時的本從昔日的桃太郎一躍而成爲東方的巨人，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下，^{〔九〕}赴日考察風起雲湧。如果說第四階段開啓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日本研究熱潮的序幕，那麼，第五階段則是名副其實的高潮。研究的動機由被動的本能反應——防禦轉爲主動的虛心學習，研究者已從知識分子擴展至所有東渡考察者：官吏、文人、實業家和學生。對中華民族來說，研究日本再也不是抽象的紙上談兵，而是活生生的現實亟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不是一種書齋式研究，而是一種社會運動！

對於上述光緒以來中國人的日本研究著作，最早予以重視並進行蒐集和整理的是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先生，^{〔二〇〕}他根據這些著作多以「東遊日記」命名的特點，將它們稱之爲「東遊日記」。今天，東京都立圖書館實藤文庫皮藏有他積畢生心血蒐集的數千種頗具特色的舊藏，其中，「東遊日記」達二二七種（含民國時期的七十七種），可謂澤被學人。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東遊日記」的名稱雖未必十全，却因其反映了近代中國人大量東渡日本，間接吸收西方文明這一歷史特質而廣爲學界所接受，「東遊日記」遂成了晚清光緒年間至民國前期國人赴日考察、留學的日記、報告和研究著作的總稱。

迄今爲止，學界對留日學生作了大量細緻的調查研究，而對官吏的考察涉足較少。事實上，由於官吏身居官職，思想成熟，在留學生大量回國發揮作用之前，是他們先期引進西方文明，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勿庸諱言，在某些東遊日記中，存在一些浮光掠影、議論膚淺、資料拼湊等弊病，但重要的不是敘述水平的高下，而是他們代表了一個敢於跨出國門，直接去國外感受新事物和新氣象的社會群體，開創了走出傳統思想的藩籬，面向世界的新風尚。這些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面對陌生的異域文明，經受的心靈沖擊程度未必相同，文化認同也不盡一致，但有一點一以貫之：筆叙日

本，意在中國，他們為謀求祖國自強自立的良苦用心躍然紙上。從甲午戰爭到今天，歷史已跨過一個漫長的時段。雖然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事實上我們面臨着與先人相同的一個課題：如何完成現代化事業。因此，這些東遊日記，不僅是中日關係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資料，更是近代中國謀求整個社會形態和文化模式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留下的生動記錄，對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也具有客觀的借鑒意義。

中國自八十年代以來，鍾叔河、王曉秋、武安隆等先生對東遊日記進行了整理與研究，^{〔一〕}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自一九八九年成立起就將東遊日記作為主要研究課題之一，近年又有熊達雲、汪婉等留日博士分別對政法、教育考察記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二〕}這說明該課題正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其史料價值正在進一步得到認識。但是，東遊日記數量龐大，館藏分散，利用極為不便，有鑒於此，我們不揣冒昧，將數年來克服種種困難苦心蒐集的這些資料整理成編，名為《晚清東遊日記彙編》，公諸同道，以期為學界做些鋪墊性工作。本叢書教育考察記部份已由杭州大學出版社先行出版，^{〔三〕}綜合、軍事、政法、農工商考察記以及唱酬等專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續出。每種或輯數人為一卷，或收一人成一書，首冠前言、解題，後附索引，影印時力求保持原貌，個別模糊不清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技術處理。

東遊日記的蒐集與研究，先後列入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一年）、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一九九八年度）以及住友財團的科研項目（一九九九年度），本叢書為其中間成果之一。

注 釋

〔一〕《長崎紀文》，一卷，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童華自序，乾隆中刊本。是書對中國銅商在長崎的貿易、日常生活等情況的描寫，可補其他同類文獻之不足。

〔二〕清前期還誕生了吳江翁廣平撰的《吾妻鏡補》（一名《日本國志》，三十卷，一八一四年自序）一書。這部著作雖非描述長崎貿易的專著，但在卷十三、十六、十七等處多次言及。詳見拙編《吾妻鏡補》——中國第一部日本通史，日本京都，朋友書店，一九九七年。

〔三〕如《申報》在創刊之年頻頻刊登有關日本的消息：「日本使臣至花旗見國君」（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一日）、「日本地震」（四月初八日）、「東洋欲改服色」（四月初十日）、「（日本）博物院」（四月十五日）、「論東洋新造金小洋錢」（四月二十八日）、「論東洋人男女同浴」（四月二十九日）、「東洋改服色」（五月初一日）、「論東洋博物院事」（五月初八日）、「日本治度信息」（五月初八日）、「日本英國近事」（五月十四日）、「日本近事」（五月二十日）、「論東洋新鑄大小銀錢銅錢事」（五月二十一日）、「論日本通商事」（五月二十四日）等等，可謂

日本的一舉一動盡在觀察之中。

〔四〕王之春此行訪日的目的在曾任兵部侍郎的彭玉麟為王著所撰的《談瀛錄序》中表述得很清楚：「欲防日而不先悉其形勢要害、風俗美惡、政治得失，則無由攻瑕擊隙，以制其死命；而又慮臨之以師旅則易啓爭端，重之以使節則反招猜忌也。思期得一不動聲色、直探巢穴、密訪周覽、洞悉霧情於胸臆者，久之難其選。王爵堂觀察聞命奮袂請行……」

〔五〕《直督李鴻章奏日使大久保抵琅環約期撤兵並請遣使駐日本片》，《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卷八頁。

〔六〕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規定：「東西洋出使各國大臣務將大小事件逐日詳細登記，仍按月彙成一冊咨送」。《清同光間外交史料拾遺》，第五卷九頁。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一九九一年。

〔七〕黎庶昌：《庚寅集三編·題襟集》，四頁、五頁，一八九〇年駐日清使館序刊。

〔八〕參見拙文《晚清文人與日本——光緒年間寓日文人考》，《中日關係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北京市中日關係史學會合編，一九九八年八月。

〔九〕例如，張百熙等提出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規定：「各省辦理學堂員紳，宜先派出洋考察。……歐美各國，道遠費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則斷不可不到……」（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册，五三三至五三四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鄂督張勳湖北實缺州縣出洋遊歷博覽周諮札》本則斷不可不到……（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册，五三三至五三四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學務處呈覆遵議各州縣派人籌備公款遊歷日本以備充當學董辦法文》（《申報》，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學務處呈覆遵議各州縣派人籌備公款遊歷日本以備充當學董辦法文》（《申報》，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對官紳遊歷作了非常具體的規定。

〔一〇〕實藤惠秀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開始了對東遊日記的研究。如《東遊日記研究序說附東遊日記目錄》（《日華學報》八二號，日華學會，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

〔一一〕鍾叔河：《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王曉秋：《近代中日啓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武安隆、劉玉敏：《嚴修東遊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一二〕熊達雲：《清末中國官民的日本視察》，日本甲府，山梨學院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一九九八年。汪婉：《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的研究》，日本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八年。

〔一三〕呂順長編：《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上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前言： 傅雲龍及其《游歷日本圖經》考

王寶平

一八八七年六月，北京同文館內，一次不同尋常的考試，中央六部保舉的五十四名官員參加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選拔出國游歷官員的考試。與以往的科舉考試不同，這次不考四書五經，而只試海防、通商、鐵道、交涉等洋務的內容。最後，傅雲龍名列第一，與其他十一名游歷官分別出洋考察。關於這次出洋的經緯、意義以及傅雲龍的《游歷日本圖經》（下簡稱《圖經》），時人前賢作了不少可貴的研究，^(一)本文就以往較少關注的以下幾個問題作些考察。

一、傅雲龍簡介

父親傅羹梅（一八〇〇—一八五五），字商岩，浙江德清尚博村人，附生，官至雲南恩安知縣，廉正居官，著有《濟世雜鈔》、《佐治雜錄》、《商岩遺書》等。卒後以「性徵孝友，品植端方」，入祀鄉賢祠。^(二)

弟妹凡六人：大弟雲萬，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舉人；刑部主事改官知縣；次弟雲夔，得旨旌孝；三弟雲昭，早卒；大妹適費，次妹適吳，三妹早殤。^(三)妻李端臨，教子相夫，三度割股療夫疾，俞樾、藤野貞子等有詩贊之。誥封一品夫人，著《紅籬室吟草》三卷、《女藝文志》三卷、《續小名錄》一卷等。^(四)

傅雲龍先後得十子一女，不幸大多夭折，有事迹可考者有下列數人：

二子傅范初（一八六七—一九一二），字公羽，號曲溪，同文館肄業，保知府、道員用，官頤和園電燈委員兼庫官並檄充

北洋機器局委員、政治官報局印刷科長等職。嗜好西學，旁及醫學和兵學，著有《算學進階》、《算學源流考》、《電化理解》、《地理雜誌》、《會典圖說》、《海運利弊考》、《許學藝文志提要》、《學經韵齋文》等書。父修《順天府志》，著游歷書，出力居多。^{〔五〕}

三子傅范冕，字章甫，天文算學學生。擅長英文，雲龍所著《美利加合衆國圖經》其月朔表、州表多出其手。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九月（傅雲龍游歷回國前夕）在京疫死，時年十八。^{〔六〕}

四子傅范翔，字君高，北洋大學畢業，西苑電燈公所委員、花翎知州。

七子傅范鉅，字子漢，北洋大學畢業，陸軍部軍實司財政處郎中、花翎道員。^{〔七〕}

長女傅范淑，字藜痴，號幼青，能文工詩，終身不嫁，惟孝養父母是樂。曾四剪股以療親，三剪股以療兄，深獲俞樾詩贊，^{〔八〕}得旨旌孝。遺有《小紅籬室吟草》二卷。^{〔九〕}

傅雲龍（一八四〇—一九〇一），字懋元，一字醒夫，德清縣監生。他的一生以游歷考察爲界，大而言之可分爲二個階段。

十二歲通經史及諸子百家言，長又研究兵學，曾以幕僚身份助守潼川，解叙永圍，收復長寧，參加過與李永和起義軍的戰事。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報捐雙月選用郎中，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入兵部武選司兼車駕司行走，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學習期滿奏留本部候補。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丁母憂回籍三年。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修《順天府志》有功，保獎俟知府分發後加三品銜充兵部則例館纂修。

在這段做京官的日子裏，由於「兵燹既戢，郎署多暇」^{〔一〇〕}。所以，傅氏「以曠分陰懼，於經嗜小學，於史嗜地理、兵制」，在學業上扎扎实實地鑽研了一番。但是，在仕途上，「郎署廿年，碌碌無所短長」。^{〔一一〕}

也許沒有日後的出洋考試，他在中國近代史上將會永遠默默無聞。但是，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有旨傳考出洋游歷官，傅氏一鳴驚人，名例榜首，赴日本、美國、秘魯、巴西、加拿大、古巴等六國考察。由於這次考試非同尋常，因此，國內媒體紛紛予以報道，^{〔一二〕}引起了社會上較大的反響。^{〔一三〕}不僅如此，這次考試也引起了國外的關注。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領事波多

野承五郎於明治二十年（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十月二十日向外務大臣伊藤博文作了詳細的彙報。

機密第廿二號

先是北京政府據言官的上奏，決定向海外各國派遣官吏進行視察。為通過考試選拔俊秀，曾紀澤侯爵等負責此事，準備了試卷。北京不愧為輦轂，學者雲集，不少人志在必得，欲爭第一。但是，這次試題出人意外，為《鐵道論》、《海軍論》等新學內容，不考儒學。因此，不少人反而紛紛落第，被開明派奪得第一。

經考試，兵部郎中傅雲龍、刑部主事顧厚焜二人被派遣赴本邦及美國，他們日前從北京出發來到本地（天津——引者），拜見李鴻章後，於十九日動身赴上海。這兩人係北京官吏中的翹楚，屬開明派。但第一次出國，與外國人接觸亦屬初次，年齡約在五十前後（其實傅為四十六歲，顧為四十四歲——引者），擅長支那文學。所以，難以預測寓日期間，考察本邦後會產生什麼感想。他們在津時，訪問了本館，希望介紹長崎的朋友，為此我們向他們介紹了日下縣知事。他們還希望介紹其他熟人。因此，估計訪日期間，他們會廣泛交友。（下略）^{（二四）}

該機密信還記載了傅氏一行的薪金、期限、旅行路綫以及同行的翻譯澤村繁太郎（詳見下）的一些情況，長達五頁（每頁十三行，每行二十字不等，參見本書卷首書影）。信的天頭上墨寫有「應上奏」的批示，估計此事也上奏到明治天皇。

傅雲龍一行從上海出發先到日本，六個多月後，再抵達美洲考察，歸途中，為出版《圖經》，又在日本停留了五個月，然後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十月十七日回京銷差。傅氏於同年十二月充會典館繪圖處纂修官，翌年以「所著游歷日本等國圖經八十六卷，纂述較多，徵引尚博，實屬留心收輯，堅忍耐勞」^{（二五）}賞加二品銜以道員分發直隸，會辦天津機器局。^{（二六）}十九年（一八九三）奉海軍衙門行知兼充海軍衙門幫總辦上行走，又會辦天津海運，二十年（一八九四）兼辦天津北洋水師內學堂旗生事務，二十一年（一八九五）總辦北洋機器局。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四月十二日卒於上海，同年十一月卜葬德清尚博村。^{（二七）}

傅氏在任北洋機器局總辦時，曾接受過日本記者川崎紫山的採訪。明治時期具有廣泛影響的綜合性雜誌《太陽》（第四卷第四號，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日）刊登了川崎的採訪記和傅氏的照片。文章詳細介紹了北洋機器局的規模，評價傅氏

「天資溫厚，待人和易，不露圭角，經術深醇，議論淵博，工於詩，長於書，並稍通時務」。文中引述傅氏的話說：「我自亞米利加歸國後，上書總理衙門，論必須改革舊法，施行新法。但是總理衙門大臣幾乎是置若罔聞。李中堂雖善知之，但不能善用之。及至今日，總理衙門總算從迷夢中覺醒，開始力圖擴充機器事業。」寥寥數語，可見傅氏在甲午海戰前，並未在機器局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才華。^{〔一八〕}

二、傅雲龍的著作

傅氏勤奮鑽研，刻苦著述，果實累累。他的著作，大體言之，可歸為以下三類。

(一) 傳統文化類

著有《字學三種》三卷（《干祿字書》、《俗書證誤》、《字書誤讀》，一八七四年）、《續彙刻書目》十二卷（一八七六年）、《說文古語考補正》二卷（一八八五年）、《光緒順天府志》一三〇卷（分纂四十五卷、覆輯十卷，一八八五年成）、^{〔一九〕}《西陵蹕程錄》一卷（一八八五年）、《鄉賢商岩公事略》三卷（一八九三年）、《纂喜廬文初集》十八卷（稿本，一八九三年題簽、浙江圖書館藏）、《纂喜廬存札》一卷（光緒年間刊）、《傅氏鈔校書》六種（傅雲龍輯，《晉書考證》、《隋書考證》、《昌平山水記》、《韻補正》、《河渠備徵》、《漕運全書》，稿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纂喜廬訪金石錄》一卷（稿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凡十種。

(二) 游歷類

撰有《纂喜廬叢書》四種（《論語》、《新修本草》、《文選》、《歸去來辭》，一八八九年）、^{〔二〇〕}《不易介詩藁》三種（《游古巴詩董》、《游秘魯詩鑑》、《游巴西詩志》，一八八九年）、《游歷日本圖經》三十卷（一八八九年）、《游歷古巴圖經》二卷（一八八九年）、《游歷美利加合衆國圖經》三十二卷（一八八九年題簽）、《游歷巴西國圖經》十卷（一九〇二年）、《游歷秘魯圖經》四卷（一九〇二年）、《游歷英屬地加納大圖經》八卷（一九〇二年）、《游歷圖經餘紀》十五卷（一八八九年題簽）、《纂喜廬文二集》十卷（稿本，一八九三年題簽，杭州圖書館藏），凡十種。

(三) 新學類

有《實學文導》二卷(一八九五年)、《繪圖比例尺圖說》一卷(一八九五年)、《考空氣砲工記》一卷(一八九五年)、《考化白金工記》一卷(一八九五年)、《纂喜廬文三集》四卷(稿本,二八九三年題簽,浙江圖書館藏),凡五種。

除以上二十五種外,^(三)傅雲龍還著有《補晉書藝文志》四卷、《德清傅氏宗譜》十二卷、《說文解字正名》十五卷、《許學文徵》二卷、《纂喜廬經翼》十卷、《金石集成》三百卷、《纂喜廬史徵》八卷、《纂喜廬子衡》四卷、《讀通鑑札記》二卷、《讀全唐文札記》二卷、《纂喜廬訪金石錄》六卷、《全漢文》五百卷、《唐文精粹》十卷、《傅氏本藝文志》四卷、《傅氏往籍略》二卷、《機器圖說》八卷、《游日本詩變》三卷,及《游美利加詩權》、《游加納大詩隅》、《傅氏進士錄》、《四庫未載書略》、《博學宏詞錄》、《北上里志》、《鄉賢商岩公年譜》、《吳柳堂先生年譜》、《姚太夫人年譜》、《北堂書鈔引書目》、《水經注碑目》、《隸續目》、《纂喜廬詩初集》、^(三)《纂喜廬詩二集》、《纂喜廬詩三集》(以上各一卷)、《軍禮通記》、《國朝軍禮纂目》、《纂喜廬別錄》(以上卷數不詳)等三十五種。^(三)它們多數係未定稿,未見刊刻。

此外,還有《全漢碑目》一卷(稿本,見黃立猷輯《金石書目》,民國毅盒叢刻本)、《漢碑逸文篇》四卷(光緒十一年稿本,見《金石書目》)、《全漢文殘稿銘》四卷(原稿本,見《四庫未收參考書目》,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油印本)。

傅雲龍以上的著作,大致折射出他一生的主要經歷:游歷前,刻苦鑽研中國傳統文化,對文字學、目錄學、方志學用力尤勤,此外,還兼及新學。^(四)這為他日後的出洋考試,以及游歷著作的撰述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游歷時,留心域外事物,苦心收集,奮筆疾書,其著作之富,在游歷使中無人可出其右。游歷後,多年在第一綫從事洋務工作,潛心於新學,對傳統文人視為形而下的槍炮、比例尺等實學身體力行,進行了研究。可以說,他的這些著述,是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文化強烈沖衝時,如何在實踐和學問上走出傳統,實現近代轉型的一個縮影。

三、《游歷日本圖經》的特色

中國的日本研究，歷史最爲悠久，但是，受時代的種種制約，鮮有親歷日本者，因此，存在不少舛誤，被黃遵憲譏爲「十不一真」。^{〔二五〕}直到光緒三年（一八七七），這種情況才開始得到根本的改變。這年，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率使團赴日，揭開了近代中日關係新的一頁，從此，中國人可以身臨其境考察，直接利用日方資料進行研究了。

綜觀這時期誕生的日本研究著作，前期以游記爲主，如何如璋的《使東述略》、張斯桂的《使東詩錄》、王韜的《扶桑游記》等即是。大約從光緒十年（一八八四）起，開始陸續出現了一批綜合性研究日本的著作，舉其犖犖大者，有黃遵憲的《日本國志》、葉慶頤的《策鰲雜摭》、陳家麟的《東槎聞見錄》、顧厚焜的《日本新政考》、傅雲龍的《游歷日本圖經》。^{〔二六〕}其中，《圖經》卷帙之豐富，內容之詳實，除《日本國志》外，沒有可以與之媲美者。《日本國志》雖然達四十卷之鉅，成書要早，但是，其全書的篇幅遜於《圖經》，出版晚於《圖經》整整七年。並且，如後所述，《圖經》在諸如日本金石志、藝文志、文徵等內容上，別具一格，深受好評。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爲，在甲午以前，《圖經》獨領風騷，代表了中國日本研究的最高水準。它與日後問世的《日本國志》一起，堪稱晚清日本研究著作的雙璧。

在《圖經》洋洋灑灑三十卷的內容中，最出類拔萃的也許當數《日本金石志》。它凡五卷，「金石志一」（卷二十三）收五代以前的金石五十九種，年代不詳者三種；「金石志二」（卷二十四）收宋代三十四種，元代四十種，明代三十二種，^{〔二七〕}年代不詳者九種；「雜錄（鐔口款識、研款識、瓦當文）」三十五種，續以及又續五十八種，附錄金石文十七篇；「金石志三」（卷二十五）爲印志和刀劍志；「金石志四」（卷二十六、二十七）爲金石年表。在傅雲龍之前，趙之謙、潘祖蔭、楊守敬等人雖然在中國對日本的金石作了程度不等的介紹，^{〔二九〕}但是，如此系統地將它大量引入中國，這是空前的，並且，如此大規模的金石著作，在日本也是罕見的。

對此，日本近代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一八六六一—一九三四）獨具慧眼，很早就予以了關注。他在《清朝史學》中論述

清末金石學成就時，稱贊《日本金石志》收載甚富。^(三〇)繼湖南之後，另一名日本著名學者神田喜一郎（一八九七—一九八四）也高度重視《圖經》，他在《藝林談叢》一書中論及日本金石學之沿革時，這樣高度評價了傅氏的《日本金石志》：

在此，特別一提的是，明治二十二年，即中國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這年清國公使館員（應為游歷使——引者）傅雲龍著《日本金石志》五卷在東京出版。此人非常有學問，赴日後，在調查的基礎上纂成《游歷日本圖經》這部大著，漸次付梓。《日本金石志》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一篇二卷，第二篇一卷，共三卷，著錄了日本的主要金石文。（中間介紹《日本金石志》內容，略）所收內容有雜駁之嫌，也有不少偽作，但是，一個外國人，在明治二十二年能寫成這樣一部著作，實在是一部令人驚訝的勞作。那時，在日本還沒有這樣一部如此系統的金石著作。^(三一)

《圖經》的《日本藝文志》也頗具特色。它共兩卷（卷二十一、二十二），對日本的圖書按四部法進行分類，其中，著錄經部著作三百七十五種，史部四百五十八種，子部八百二十一種，集部四百二十六種，達二千零八種。這是中國人對日人著述的首次系統的分類，其著錄之豐，是史無前例的。^(三二)

《日本藝文志》後還附有《中國逸藝文志》，上起《論語義疏》，下迄《筆語》，對四十種中土逸書作了詳細的解題。雖然它尚有遺漏之處，但不失為是迄今最為完整的一份中國逸書目錄，受到了學界的矚目。內藤湖南如此評價道：

支那之書籍彼逸而存於我邦者，迄今已發現數十部。林述齋之《佚存叢書》、黎庶昌之《古逸叢書》，收之甚夥，但尚不完備。傅雲龍之《游歷日本圖經》中，有《逸藝文志》一篇，稍稱完備。^(三三)

湖南還對《中國逸藝文志》作了重新整理著錄，並且，根據《佚存叢書》、《古逸叢書》等對其遺漏之書作了補遺（參見本書「藝文索引」）。

《中國逸藝文志》也受到中國文獻學家的關注，如中國國家圖書館皮藏有該書，為西諦（鄭振鐸）舊藏，此或為典型一例。

除《日本金石志》、《日本藝文志》外，《日本文徵》也是《圖經》中獨具特色之處。在卷二十八、二十九的兩卷中，傅雲龍著錄了「中國人紀日本事之文」十二篇、「日本人文」二百四十篇、「別國人述日本事之文」二篇（參見本書「藝文索引」）。其

中，日人撰述的文章中，著者既有平安時代的空海、菅原道真等，更有竹添進一郎、岡千仞、巖谷修、三島毅、中村正直等與傅雲龍同時代的漢學家；並且，在內容上也有諸如木戶孝允的「萬法精理序」（五九四頁上）、大久保利通的「英國院章程」（五九四頁上）等新學方面的文章。如果說，陳鴻誥的《日本同人詩選》（四卷，一八八三年）、俞樾的《東瀛詩選》（四十四卷，一八八三年）係中國人選編的收載日人漢詩最富的詩集的話，那麼，《日本文徵》則在彙集日人漢文方面，享有最富之譽。雖然在此之前，《日本圖纂》、《日本考》、《吾妻鏡補》等著作也收有不少日本的詩文，但是，受時代的限制，無論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都不能與《日本文徵》相提並論。可以說，《圖經》是民國之前中國引進日本漢文最多的一部著作。

此外，在卷十八《日本外交》中，傅雲龍彙集了不少有關中日關係方面的史料，其中，《往籍交際條目》（三〇五頁）對歷代載有中日關係史料的中國典籍作了介紹（參見本書「藝文索引」）；在《交際詩目》（三〇九頁）中，對唐至明代的中日往來詩作了鉤沉；在《交際文》（三一二頁）中，對隋至明代的中日往來文作了搜集（參見本書「藝文索引」）。雖然，該史料並非十全十美，但是，在當時，還沒有第二位中國人做過這項有意義的工作；並且，裏面的不少史料，在歷經一個多世紀的今天，仍然對我們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值得重視。

也許正因為《圖經》擁有上述種種特色，再加上政治上的需要，《圖經》也受到了光緒帝的贊許。先是本書與傅氏的其他游歷書上呈後，「德宗側席慰勞，褒曰書甚詳」；^{〔三四〕}黎庶昌任滿回國在接受光緒帝的召見時，《圖經》再次受到了嘉許。^{〔三五〕}《圖經》的這些特色也引起了學界的重視，一些內容在當時還被收入《小房壺齋輿地叢鈔》之中，藉助於該叢書的有力影響，在清末社會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如《叢鈔》第十帙收「日本沿革」（卷二地理志二）、「日本疆域險要」（卷二地理志二）、「日本山表說」（卷五地理志五）、「日本河渠志」（卷七河渠志）外，再補編第十帙載「日本風俗」（卷十風俗）。

此外，《小房壺齋輿地叢鈔》還載有大量的日人撰寫的游記，它在十九世紀末問世的大量叢書中，最富特色，頗具影響。據查，其中下列十三篇文章（皆載第十帙）也見於《圖經》的《日本文徵》之中（括號內為《圖經》的頁碼）。是《叢鈔》別有所本，抑或取之於《日本文徵》？待考。但是，《圖經》出版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叢鈔》（正編）梓行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在時間上正好相銜接；並且，《叢鈔》亦收《圖經》的其他內容。因此，很難說，《叢鈔》所收的一半日人游記^{〔三六〕}

與《圖經》相重是偶然的。如果這一推測屬實，那麼，《圖經》在清末的作用將會得到進一步的顯現。

豈止快錄一卷，林長孺（五八一頁）

登富嶽紀一卷，太宰純（五六四頁）

登富士山記一卷，澤元愷（五七二頁）

鹿門宕嶽諸游記一卷，釋紹岷（五七八頁）

游嵐峽記一卷，源之熙（五六九頁）

游石山記一卷，釋大典（五七〇頁）

登金華山記一卷，澤元愷（五七三頁）

游松連高雄二山記一卷，安積信（五八五頁）

霧島山記一卷，橘南溪^{三七}（五八六頁）

游天王山記一卷，市村水香（五九二頁）

瀧溪紀游一卷，鈴木恭（五七一頁）

游綿溪記一卷，廣瀨謙（五七九頁）

游保津川記一卷，山田敬直（五九五頁）

總之，《圖經》除措意天文、地理、河渠、食貨、考工、兵制、職官等新政內容外，還「兼及古事軼聞」^{三八}，在不少方面可與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互相取長補短。

四、《游歷日本圖經》的主要協助者

從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九月二十九日抵達長崎，到翌年四月十九日離日赴美，又從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四月二

十八日自美返日，至同年九月二十一日離開東京，傅氏在短短的十二個月中，編纂、出版了三十卷之鉅的《圖經》。其效率之高，內容之富，令人咋舌。這一方面固然有賴於他超人的勤奮和出眾的文才，另一方面，也與中日兩國友人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據考，下列人士程度不等地為傅氏撰寫《圖經》提供了寶貴的支持。

黎庶昌（一八三七—一八九八）

字莼齋，貴州遵義人。曾為曾國藩幕僚，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任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的參贊，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十二月至十年（一八八四）八月，以及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十一月至十六年（一九九〇）十二月，兩度出任駐日公使。傅氏訪日時，時值黎氏第二次使日未久。

傅氏似乎與黎氏比較投契，「黎大臣庶昌實事求是者也。雲龍性差近所繇，受益宏多」。^{（三九）}黎氏或與傅氏切磋訪書的體會^{（四〇）}，或拔冗為之嚮導^{（四一）}。黎氏還受托為傅氏之父作《雲南恩安縣知縣傅府君墓表》。^{（四二）}

傅氏離日赴美時，《圖經》已成二十六卷，黎氏為之作序，並「告謂體例甚善，俟從他國回至日本詳核」。^{（四三）}回日後，傅氏「將出草藁重訂，以時促為慮」。^{（四四）}黎氏勉勵之，「果成完編，雖踰限無傷也。於是懋元倚余言，為壯發篋，陳書晝夜排比，朱鉤墨校，用力益勤」。^{（四五）}在上梓過程中，傅氏「即疑即問，即譯即筆，於是錄者、圖者、排字者、鏤銅者、鉛印者、石印者，萃厥技藝，期於成書」。而這一切「非黎大臣導之，勸之，洞甘苦而慰勞之，幾何不疑懼交迸也」。^{（四六）}

因此，黎庶昌作為駐日大臣，在精神上對傅氏予以了鼓勵；在人員安排上，亦提供了可貴的幫助。值得一提的，是，《圖經》問世後也得到了黎氏一如既往的關照。傅氏委托黎氏為之分發《圖經》十部，在光緒帝親見時，「天語垂詢，因問東洋古書而及尊著《圖經》，弟盛言閣下之勤能為不可及也」。^{（四七）}

對黎氏的深情厚意，傅氏也投桃報李。他為黎氏題寫了《夷牢亭圖記書後》^{（四八）}；在《圖經》的「文徵」中，收錄了日人致黎氏的《扶桑木記》（六〇〇頁上）和《上黎公使書》（六〇〇頁下）二文，以及黎氏的《教育會演說》、《游日光山記》、《刻古逸叢書序》、《跋日本人唐寫卷子本注楞伽經後》、《書森立之壽藏碑後》、《跋宮島誠一郎戊辰八月上闕書》等七篇文章。

「文徵」共著錄了「中國人紀日本事之文」十二篇，而其中黎氏的文章達七篇之多，足證兩人交誼之厚。

陳矩（一八五〇—一九三九）

號衡山，貴州貴陽人，監生。喜金石，好古書，光緒十五年正月十九日（一八八九年二月十八日）至翌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八九一年一月二十日）作為第四屆駐日公使黎庶昌的隨員出使東瀛。^{〔四九〕}他在短短的二年中，「獲遺書百餘卷、宋元槧本書二百餘卷、日本金石四千餘宗、名人著述未刊行者五百餘卷」。^{〔五〇〕}著有《靈峯草堂集》四種（《滇游草》、《悟蘭陞》、《東游文藁》、《東瀛草》）和《靈峯草堂叢書》四種（《孟子外書補注》、《孟子弟子攷補正》、《臆氏爲鐘圖說補義》、《天全石錄》），從這些書目中也窺見他的嗜好。

傅氏第一次赴日時，陳矩尚未上任，未及與傅氏相識，但已耳聞傅氏著述勤奮等一些事迹。逾年，傅氏從美國回日後，「同居日本使署，朝夕既見，觀其著書，官骸並用，鷄膠膠乃就，枕天明則又披衣起矣，果如客所言」。於是兩人志同道合，「暇輒聯軫入書肆，凡屬有用之編，博諷旁覽，不惜金幣購求。（中略）而駕部猶探索未已。非夫性情堅定，劬學耐勞，幾何不畏難而自止也」。^{〔五一〕}

此外，傅氏在日刊刻的《論語》、《新修本草》、《文選》和《歸去來辭》四種古籍（收入傅氏《簞喜廬叢書》）皆得之於陳矩。^{〔五二〕}他還對傅氏搜集金石，提供了許多無私的襄助。明治前期的漢文學家小山朝弘如此評價道：

清國陳君衡山，學問淹博，鑒識精審。客歲隨星使黎公駐在我邦，署務餘暇，廣求金石遺文。時傅郎中懋元奉命游歷日本等，亦搜索古迹。衡山大贊其業，出乎生所聚，且身抵諸州，勿論破驛荒村，幽壑斷港，歷揭跋涉，探訪殆遍。自豐碑片石、^{〔五三〕}佛塔鐘銘，至瓦經函識、古印刀劍，銘款係金石文字者，凡四千八百有奇，彙作《日本金石志》四卷。其好古之篤，氣力之厚，真可嘆服也。（下略）^{〔五四〕}

陳矩的上司黎庶昌也認爲：

（傅雲龍）又得隨員陳君衡山頗與同志，佐之蒐討，未及四月，《圖經》三十卷告成。^{〔五五〕}

對於陳矩的鼎力相助，傅雲龍也予以承認：

訪古之助，賴貴陽陳氏矩力居多。生平友益，極不能忘，矧其受多聞益於海外歟。^{〔五六〕}

並且，傅氏在《圖經》的《日本金石志》中，也屢屢提及陳矩，或感謝助訪之功（四一八頁上、五二〇頁下），或明記資料源自於陳（五〇〇頁上）。此外，還在「文徵」中特意收陳矩的《建武劍銘有序》和《記遵義黎欽使純齋先生刊古逸叢書》（五五〇下）二文。

陳矩的高風亮節，受到了人們的高度稱贊。趙藩在為陳矩的《靈峯草堂集》一書作序時這樣寫道：

其在日本也，獲其國金石遺文至四千餘種、遺書百餘卷、宋元槧本書二百餘卷、古近著述未刊行者五百餘卷。時德清傅懋元郎中游歷至東國，纂《日本圖經》三十卷，五月而成。衡山實佐之蒐討，見者服其詳贍，衡山不自矜也。（下略）

正因陳矩為編纂《日本金石志》貢獻不小，因此，帶來《日本金石志》的著作權的爭議：或說為傅雲龍，或說為陳矩，或主張兩人合著，莫衷一是。^{〔五七〕}可能合著說更接近事實吧。

中井兼之（一八三一—一九〇九）

號敬所，山梨縣人，篆刻家，師從濱村藏六（第三代），為日本近代篆刻藝術的確立與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有《拙鐫》、《御印冊》、《印譜考略》、《皇朝印典》、《對鷗莊印賞》、《日本印人傳》等著遺世。在《圖經》金石志部分中，《如意輪觀音大士造像記》（三九九頁上）、《二天造像記》（四〇二頁下）、《織田邨社鐘款識》（四三一頁上）等精拓本皆得之中井。能在異域邂逅同好，傅氏不勝喜悅，他在《游歷日本圖經餘紀》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條中稱中井「嗜六書，精篆刻」，並在為中井所作的序中對他作了較高的評價：「日本非中國同文者，與易西紀後，學西文如不及，漢文寢廢，遑問許學。不意通籀篆有如中井兼之者，家在小西湖（即東京上野不忍池——引者）南，霜鬢種種，然髮短心長，手一編斲正不置，出餘技篆印，有古灑，以所著《篆體正變》問序於雲龍。（中略）中井目觀手注，不下三十餘書，點畫互參，幸也幸也（下略）。」^{〔五八〕}

初山逸也（一八五五—一九一九）

字季才，號衣洲，別號衣浦漁叟、櫻雨堂主人等，名古屋人。擅長漢詩文，先後任《國會》、《東京朝日新聞》和《花香月影》的編輯。一八九八年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主筆，一九〇五年赴天津任《北洋日報》主筆，翌年擔任保定陸軍學堂教習。主要著作有《明治詩話》、《燕雲集》、《鬢絲讖話》、《易占要略譯注》、《支那骨董叢說》等。傅雲龍在日時，相伴兩月，他認為初山「性沈潛，通漢學，旁通西學，適用才也」，「雲龍述《游歷日本圖經》三十卷，校讐之役，資初山氏逸也力居多」；^{〔五九〕}「述《日本徵兵分類表》、《徵兵志願表》、《徵兵身格表》，嗣是增校字人，而日本人初山逸也校力居多」。^{〔六〇〕}此外，傅氏在撰述《游歷美利加國圖經》「文徵」時，初山充分發揮他擅長英文的特長，參與了是書的資料翻譯工作。^{〔六一〕}

澤村繁太郎

北京留學生，耶穌教會會員，先在上海耶穌學校，後轉入北京耶穌醫院學醫。同時，研習中文。由於會日語、英語和中文，由同文館總教習丁韋良舉薦與傅氏同行，其任務是協助編纂考察報告。^{〔六二〕}有據可考的有，他幫助審訂《圖經》中日語假名（平假名、片假名、濁音）的中文讀音，^{〔六三〕}為《游歷美利加國圖經》翻譯了「文徵」中有關美國的書目。^{〔六四〕}

半井真澄（一八四三—一九一七）

時為京都府知事屬吏，著有《神職寶鑑》、《二葉乃楓》、和氣公御傳記，餘未詳。在京都參觀時，傅雲龍有賴於半井的嚮導不少。據《游歷日本圖經餘紀》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載，「西京圖書金石，皮藏古寺居多，半井真澄實司之。能詩，且工和歌，即倭歌也」。半井先是替傅氏安排了住宿，翌日小游。十九日游智恩院，視《菩薩處胎經》、《梵女首意經》、《持珠校量功德經》、《中阿含經》、《黃石公三略》；在東寺，參觀了《空海請經目錄表》、小野篁書《般若心經》等十幾件寫經，還閱覽了唐寫本《玉篇》第二十七卷、空海的《篆隸萬象名義》、《論語》四卷、《史記》二卷、《莊子》等等。半井並且答應傅雲

龍，傳抄《玉篇》。二十日，游天滿宮，閱菅原道真書《妙法蓮華經》等，又在大德寺參觀了許多宋、明時期的古畫。《日本金石志》錄有《法隆寺釋迦銅立像背銘》（四〇一頁下）。先是傅氏寄翰委托半井拓寫觀音坐下字，可是，書發未久從別處已得之，於是，傅氏再致函，以觀音坐下字從半井處交換得《法隆寺釋迦銅立像背銘》拓本。傅氏認為該拓本為《古京遺文》所未收，「詫為神助」。^{〔六五〕}此外，據《日本金石志》（四三七頁下），神護寺鐘造於唐代，其鐘銘世稱三絕：橘廣相之文，菅原是善之銘，藤原敏行之書，半井向傅氏出示了其初拓本，等等。總之，半井利用他的職務之便，提供了不少方便。

除上述人員以外，其他還有傅雲龍的三子傅范冕和二子傅范初等人也為《圖經》的編纂提供了幫助。前者事迹已見前述；^{〔六六〕}後者在父親動身前，就作了一些準備工作，^{〔六七〕}茲不一一贅述。

五、《游歷日本圖經》的參考資料

如上所述，《圖經》具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而之所以能形成這些特色，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大量參考、引用日本方面的文獻資料。傅雲龍在編撰《圖經》時，除了利用了當時日本公佈的各種統計材料外，還參考了不少書籍。目前，已經可以確證的參考書主要有以下這些：

《藝苑日涉》

十二卷，村瀨之熙（一七四六—一八一八）著，有日本文化四年（一八〇七）、文政二年（一八一九）等版本。本書旁徵博引，對日本的人名、官名、文字、風俗、音樂、百戲、民間歲節、飲食、服飾、工藝等內容進行考證辨源，是一部用漢文寫成的高水準的學術性著作。傅雲龍在《圖經》的卷十「風俗」（如二二五頁上、二二〇頁下、二二二頁上）、卷十一「食貨」（如二三四頁上、二三五頁）和卷二十「文學」（如三五八頁下）等處多次引用了該書。

《兵要日本地理小志》

三卷，中根淑（一八三九—一九一三）著，有陸軍兵學寮一八七三年版等。中根字君艾，號香亭，東京人。明治時期的漢學家、史學家，一八七二年入陸軍參謀局，以編撰《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舉成名。後轉職於文部省，任編輯官。著有《日本文典》、《香亭雅談》、《香亭藏草》、《香亭遺文》等。是書對全國的山川、河湖、海灣、港口、氣候、風土、歷史、政治、物產、人口作了簡明扼要的記載，是日本第一部介紹日本軍事地理的著作。首屆駐日公使團隨員姚文棟曾將它譯成中文，由總理各國事物衙門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出版。《圖經》的卷十「風俗」（如二一四頁下）等有引用。此外，在卷四「地理」（如九五頁下）和卷十「風俗」（如二一五頁下）中，傅氏屢屢提及中根，或予以辯駁，或引用其說，不一而足。

《好古小錄》

二卷，附錄一卷，藤原貞幹（一七三一—一七九七）著，寬政七年（一七九六）出版。分金石、書畫和雜考，凡一百八十二條，係著者的好古隨筆集，末尾附有三十多幅圖。《圖經》在卷二十三「金石志二」（如三九八頁下、四〇二頁下、四一三頁上、四一六頁下）和卷二十四「金石志二」（如四九四頁下、五〇五頁上）等處多次引用了是書。

《好古日錄》

卷次、著者、出版年悉同《好古小錄》。始於「秦璽」，終至「相感」，凡一百十九條，為藤原的好古隨筆集。《圖經》卷二十四「金石志二」（如四九五頁下）和卷二十五「金石志三」（如五一五頁上）等參考了該書。

《集古十種》

八十五卷，松平定信（一七五八—一八二九）編，收有肖像、扁額、文房、名物古畫、碑銘、鐘銘、銅器、甲冑、弓矢、旌旗、刀劍、馬具、樂器、印章等類的圖片，內容極為豐富。《圖經》卷二十三「金石志一」、卷二十四「金石志二」中，大量錄自該

書。有的注明了出自《集古十種》，有的未必一一注明，如「馬場近津明神地內碑」（五〇〇頁上）、「楠正成墓碑」（五〇三頁下）、「肥後石敢當碑」（五〇四頁下）、「高貴寺下乘碑」（五〇四頁下）等等，不一而足。

《古京遺文》

一卷（據文政元年（一八一八）自序爲二卷），狩谷掖齋（一七七五—一八三五）著。狩谷係江戶時代後期著名的漢學家，精於考據。是書收日本古金石三十二種，被譽爲日本金石著作的經典。傅雲龍在《圖經》的卷二十三「金石志一」中，幾乎轉錄了《古京遺文》的全部內容。

《金石年表》

不分卷，西田直養（一七九三—一八六四）輯，天保九年（一八三八）出版。上起推古元年（五九三），下至慶長十九年（一六一四），開日本金石年表的先河。該書曾被收入潘祖蔭的《滂喜齋叢書》中，在清末中國也有一定的影響。傅雲龍在《圖經》的金石志中多次言及本書，或贊同（四五一頁上、四八〇頁下），或正之（四六一頁下），或補之（金石志四、金石志五）。

此外，傅雲龍在《圖經》中還程度不等地參考了其他日本書籍，如《倭漢三才圖會》、《菅家文章》、《博古堂集古印譜》、《埋麝發香》、《天璽瑞寶十種》等等，因篇幅限制，今不贅述。

六、《游歷日本圖經》的版本

本書中日館藏並不鮮見，筆者經眼的有浙江圖書館（十四冊）、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十四冊）、大阪府立圖書館（十四冊）、關西大學圖書館（泊園文庫，十六冊）、東京都立圖書館（實藤文庫，十六冊）等藏本，皆三十卷，^{〔六八〕}深藍封皮，無題

簽。其中華師大、關大、都立圖書館本僅見黎庶昌的序，而大阪、浙圖本還在黎序之前，依次載有李鴻章、俞樾和袁昶的序。李、俞、袁三序撰於傅氏回國之後，當係日後補入。浙圖本印有此三序的二紙，僅插在《圖經》的卷首，未與全書裝訂在一起即可一證。

李鴻章除《游歷日本圖經叙》外，還為傅雲龍之父撰寫了《德清鄉賢府君祠堂碑》^(七〇)。傅氏出訪前兩度赴津拜訪李氏，回國後，屢屢向他上書獻策^(七一)，似乎深得青睞。俞樾與傅氏同鄉，他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春認識傅雲龍，對他印象頗佳：「有學有行，君子人也」^(七二)，「曠代逸才，而中朝奇士也」^(七三)。俞樾還為傅父作《傅商岩傳》^(七四)，作詩贊頌傅氏妻女割股療病之舉^(七五)等等。

不少《圖經》的扉頁正面天頭中央鈐有「御覽」朱印，如華師大、浙圖、大阪和關大本即是，有的如華師大本還鈐有「重校」篆書詳細之印。傅雲龍的著作其他鈐有「御覽」印的有，《游歷美利加國圖經》（日本東北大學狩野文庫，印小）、《游古巴詩董》、《游歷古巴圖經》（浙江圖書館，印大）；鈐有「騷」篆書詳細之印的有，《游古巴詩董》、《實學文導》（以上浙江圖書館）、《續圖比例尺》（都立圖書館實藤文庫）。傅氏的游歷書上呈光緒帝御覽後，受到「實」篆書詳細的褒獎。兩印疑係傅雲龍引以為榮所刻，不排除冀其多售之動機。

《圖經》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在日本東京出版後，其中的《日本金石志》五卷似乎還單獨出售過。它有着單獨的內封；南京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七六)、單獨皮藏有該書（皆四冊），或可作為一證。

此外，《圖經》還有下列兩種抄本。

《日本圖經》，一冊，南京圖書館藏，始於府縣分疆表，抄自《圖經》「地理三」，抄者、時間等未詳。

《日本金石志》，六冊，日本石田肇藏，鈐「鬼洞文庫」朱文印，《圖經》金石志「印志」和「刀劍志」除外）精抄本。^(七七)

《圖經》卷帙浩大，排版複雜，加上瓜期逼迫，因此在排版時，除木刻外，「以銅版鏤圖，以鉛字列表，以石印濟木雕所不逮」^(七八)四管齊下，以期早成。這樣，「急救章」勢必會給本書的質量帶來一些影響。例如，有些版面欠清晰（如《日本藝文志》一、二）；有些地方存在着舛誤，如，游歷日本圖經目錄（六至七頁）、金石文篇目錄（三九五頁、四四三頁）與正文相

勘，出入較多；本書在卷端和版心（卷次、頁碼）上，也存在着一些明顯的錯誤，現臚列如次，以期引起注意。

頁碼	誤	正
一〇〇頁下	日本地理	日本地理四
一一六頁上	日本地理六	日本地理五
二〇四頁下	日本經圖十	日本圖經十七
三〇〇頁上	日本圖經第七	日本圖經十七
三〇一頁上	日本經圖十七	日本圖經十七
三三九頁下	日本圖經七	日本圖經十八
三三三頁上	日本圖經十八	日本圖經十九
四三三頁上	日本圖經廿四	日本圖經廿三
四四四頁下	日本圖經廿三	日本圖經廿四
四六五頁上	日本圖經廿三	日本圖經廿四
四九五頁下	日本圖經廿三	日本圖經廿四
四九六頁上	日本圖經廿三	日本圖經廿四
四九七頁上	日本圖經廿三	日本圖經廿四
四九八頁下	日本圖經廿三	日本圖經廿四
五五六頁上	十七	十九
五五六頁下	十八	二十
五七五頁下	日本圖二膏十九	日本圖經二十九

《圖經》問世一個多世紀以來，雖然以其詳實性和學術性受到國內外不少學者的重視，但是，由於卷帙浩繁，圖表、金石衆多等原因，一直不見再版，因此，直接影響了《圖經》應該發揮的作用。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影印出版，這不啻給廣大學人帶來了一個福音。本書的出版先後得到了傅雲龍的曾孫傅訓誠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張曉敏副總編、王純、秦志華編輯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楊同甫先生的鼎力支持，在此一並表示衷心的謝忱。我還要感謝原杭州大學出版社編輯何明春老師，是她以學者的睿智和職業的敏捷，促成了本叢書的誕生。往事如昨，怎一個「謝」字了得！

壬午年國慶

注 釋

〔一〕代表性的研究有：

熊達雲：《近代中國官民之日本視察》第二章「最初的中國游歷官之來日」，（日本）成文堂，一九九八年。佐佐木揚：《清末中國的日本觀與西洋觀》第三章「一八八〇年代末清朝游歷官之外國情況的調查」，（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二〇〇〇年。王曉秋：《晚清中國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舉——一八八七年海外游歷使初探》，《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二〇〇一年第三期。

〔二〕傅雲龍：《鄉賢商岩公事略》卷一，一頁，一八九三年刊。

〔三〕同注〔二〕卷三，九頁。

〔四〕《德清縣新志》卷九，一八九〇年刊。

〔五〕同注〔四〕卷八，一二頁。

〔六〕同注〔四〕卷八，三一頁。

〔七〕傅范翔傅范鉅事迹據浙江圖書館藏傅雲龍檔案《中華民國銓叙局僉事清封通議大夫花翎道員先考公羽府君行狀》。

〔八〕《傅氏婦三割股，女再割股詩》，載《春在堂詩編》二二（丁巳）一八八七—一八八九編，七頁。

〔九〕同注〔四〕卷七，二五頁。

〔一〇〕同注〔四〕卷九，二頁。

〔一一〕傅雲龍：《游歷日本圖經》卷三上「叙例」。

〔一二〕如《申報》光緒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發表了將要舉行考試的消息；六月二十二日介紹了考試內容和初試合格者名單；九月十二日公布了十二名最後錄取者名單，並在報首全

文刊登了傅雲龍的《記中國自明代以來與西洋交涉大略》的試卷；九月二十五日發表評論《論游歷人員之貴重》；十月一日發表《游員與隨員不同說》的文章，等等。

〔一三〕如李慈銘在《越縕堂日記》光緒十三年閏四月二十四日條中對此事有較詳的評論。

〔一四〕《天津駐在領事波多野承五郎致外務大臣伯爵伊藤博文之書簡》，載日本外交史料館藏《清國人內地旅行與歐美人同樣許可雜件》。

〔一五〕浙江圖書館藏傅雲龍檔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保獎傅雲龍游歷奏略》。

〔一六〕以上除注明的外，皆據浙江圖書館藏傅雲龍檔案《紅白奏》。此係傅氏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十月會辦天津機器局期滿甄別片，內容為自己的履歷，時年五十一歲。

〔一七〕以上據秦國經：《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六，四七三、四七四（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以及浙江圖書館藏傅雲龍檔案《誥授資政大夫覃恩晉封光祿大夫戴花翎二品頂帶奏保出使大臣直隸補用繁缺道傅府君墓誌銘》（草稿）。

〔一八〕傅雲龍在北洋機器局總辦任上時，有人奏他任意妄為，子范根（後改名范翔）、范鈺（後改名范鉅）在局招搖等五項罪名。榮祿奉諭查辦此事。最後查明，雖然多數屬於子虛烏有，但傅氏在用人上有不知遠嫌，自輯之書飭令學堂匠役多人代為鈔寫罷印，有過失之處。榮祿請旨將傅氏交部議處，能否勝任，由北洋大臣隨時留心查看，斟酌辦理。（《著榮祿查奏北洋機器總局督辦傅雲龍被參各節之上諭》（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三八九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八九六年六月四日）、《榮祿奏遵查傅雲龍被參各款情形摺》（《軍機處錄副奏摺檔》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轉引自《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編委會《中國近代兵器工業檔案史料》一一〇頁、一一二頁。兵器工業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這樣，傅氏是年被降調，旋經王文韶奏留北洋，總辦機器局。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兼充神機營機器局總辦（《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六，四七四頁）。

〔一九〕《順天府志》中，傅氏編撰的《方言》二卷、《河渠志》十三卷另有單行本問世。又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了《光緒順天府志》（十六冊）排點本。

〔二〇〕《養喜廬叢書》四種內容上雖係中國傳統文化書籍，但為傅雲龍游歷日本時所輯，並且刊於日本，故入游歷類。

〔二一〕有關傅雲龍的這些書目，其版本和內容等可參見拙文《傅雲龍日本研究的周邊——以著作為中心》（《浙江與日本》（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一九九七年）。

〔二二〕據《版書偶記》（四八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此書為《養喜廬詩稿初集》一卷附《觀海贈言》一卷，光緒十三年鴻文書局石印巾箱本。

〔二三〕以上據浙江圖書館藏傅雲龍檔案《養喜廬所著書目》，和注（一七）整理而成。前者一冊，未定稿，傅雲龍晚年編，著錄傅氏著作的序跋和提要；後者係傅雲龍之女傅范淑所擬。

〔二四〕《養喜廬文初集》（十八卷）為傅雲龍游歷前撰述的文集，雖然其以治小學、經學和史學為主，但是，也有如「原廠」、「原化學」、「地圖經緯說」、「地橢圓說」、「陸兵論」、「海防論」、「兵通論」（以上卷一）之類的内容。說明傅氏對新學也比較關心。

〔二五〕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二〇〇尾聲。

〔二六〕關於這時期的日本研究的分類，詳細參考本書的《總序》。

〔二七〕其中「高藏寺鐘銘」二種，據傅雲龍自稱，應為宋代，誤印於明代，故算入宋。

〔二八〕其中目錄中所列的「石浮圖文」一種，正文中未見，所以實際是八種。

〔二九〕詳見石田筆《傅雲龍的〈日本金石志〉與陳矩》，載書學書道史學會編《第四回國際書學研究大會紀念論文集》（日本）萱原書房，二〇〇〇年。